

#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初探

胡乃武

---

〔**内容提要**〕系统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理论问题，从创立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出发，联系实际，总结了我国三十年来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经验，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类型和特征，揭示了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盈利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探讨了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质量等问题。

〔**作者简介**〕胡乃武，生于1934年，1962年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主要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的调节与控制的研究，主要著作有《经济杠杆导论》、《论适度积累率》等。

---

经济增长理论是西方宏观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著述颇多。我国的建设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也应当创立自己的经济增长理论，以便提高我们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

## 一、经济增长的类型和指标选择

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理论，主要是阐明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规律性。经济的增长，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和经济结构、比例关系、经济效益密切相关的。因此，我们不能孤立地研究速度问题，而应当在四者的统一中来研究。

在速度、结构、比例、效益的相互关系中，中心的问题是什么？过去我们认为，中心的问题是速度问题。因此，忽视按比例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产值和速度。其结果是：速度虽然不低，但经济效益很差，人民得到的实惠不多。这种经济增长类型，可以称之为数量增长型或粗放增长型。

1981年11月，赵紫阳同志在全国人大五届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总结了我国三十多年来的经济建设经验，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内容的十条建设方针，指明了我国今后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这就是：速度恰当、经济效益比较好，使人民能够得到更

多的实惠。这种经济增长类型，可以称之为效益增进型或集约型增长。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速度问题就不重要了。速度问题，始终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它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和人民的富裕幸福。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取得国家政权以后，它的最主要最根本的利益就是增加产品数量，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sup>①</sup>特别是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民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来说，力争有一个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意义就更加重要。我们所要反对的是那种脱离实际的“高指标”和“高速度”，但不能因此就忽视速度问题。

由数量增长型转变为效益增进型，必须选择恰当的反映这一经济增长类型的指标。在我国现行统计工作中，衡量宏观经济增长的指标，主要有两类：一类是用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一类是用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两类指标，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

按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能够全面反映各部门间现实的经济联系和生产结构的变动，这是它的主要优点。它的缺点是：其一，总产值是按“工厂法”计算的，受转移价值的影响较大，重复计算较多，因此，它所反映的速度有一定的水分；其二，按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如果把它作为考核指标，往往会促使企业追求生产那些消耗原材料较多的产品，使用较贵重的原材料，增加不必要的在制品，因而不利于节约物化劳动消耗，不利于增加符合人民需要的最终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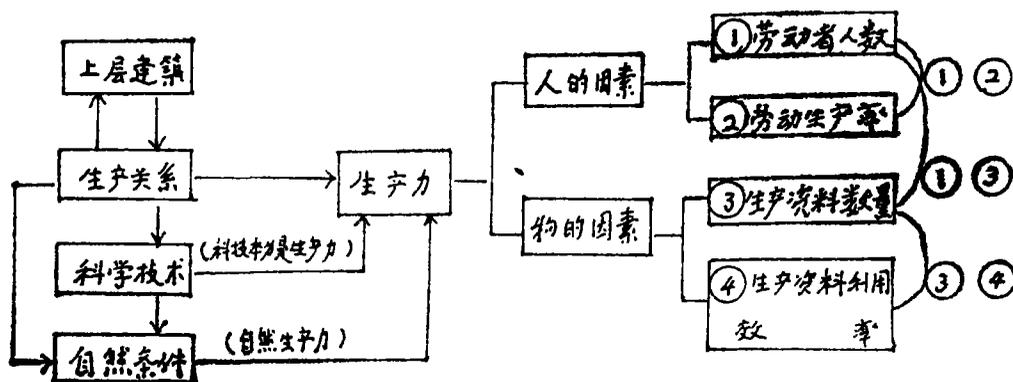
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主要有以下三个优点：首先，由于它消除了转移价值的影响，所以能够促进企业节约物质消耗，提高产品质量，增加零配件生产；其次，由于它不受物化劳动重复计算的影响，所以它所反映的经济增长速度比较真实；最后，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同工资、盈利、财政收入和经济效益等指标发生直接联系，形成具有可比性的指标体系。当然，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有一些缺点，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它受国家价格政策的影响较大。在价格严重扭曲的情况下，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部门、地区的速度和生产结构的变动；其二，如果把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作为考核指标，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有不利于专业化协作和技术进步的缺点。因为专业化协作和技术进步，会引起产品价值构成中转移价值的比重上升，净产值的比重下降，从而就会给资金有机构成高的部门的合理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总的说来，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比按总产值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优点多些。因此，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应当主要采用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指标。

## 二、影响速度的因素和确定速度的方法

为了正确地确定一定时期内的经济发展速度，就必须了解影响速度的因素。从大的方面来看，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类：第一类是生产关系的因素，第二类是上层建筑的因素，第三类是科学技术的因素，第四类是自然条件的因素，第五类是生产力的因素。这五类因素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影响作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和物的因素。生产力中的人的因素，又可以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因素：一个是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人数；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生产力中的物的因素，同样可以分解为两个具体的因素：一个是生产资料的数量；另一个是生产资料的利用效率。上述五类因素同生产力中的这四个具体因

素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图式表示如下：



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上述四个具体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而是相互结合在一起共同发生作用的。这种结合关系，大体上可以分为如下三组：

第一组结合关系，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结合。在这种结合关系中，既应使二者在数量上相适应，又应使二者在结构上相适应。就二者的数量适应关系来说，正象马克思所指出的：“一定量的生产资料，必须有一定数目的工人与之相适应”<sup>②</sup>。如果劳动者人数过多，而生产资料不足，就会使一部分劳动者不能发挥其作用，形成人力的浪费；如果用降低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的办法来使二者相结合，就会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相反，如果生产资料的数量过多，而劳动者人数不足，就会使一部分生产资料闲置起来，形成物力的浪费。在上述三种场合下，都会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晌。一般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应当在提高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的基础上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人力和物力都得到充分的利用，从而才能使速度和效益统一起来。

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之间的结构适应关系来说，不同生产部门、不同工种的劳动者需要有相应的生产资料与之相结合。如果二者在结构上不相适应，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专业化协作的发展，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结构上的结合问题，更加突出了。就劳动力的结构来说，据外国学者的统计，在现代化企业里，需要有10%的熟练工人，40%至60%的受过中等教育的劳动者，20%至40%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目前我国工业企业现有职工队伍普遍存在三低：一是文化水平低。据1979年对2,076万名职工的调查，80%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其中文盲半文盲占7.8%，小学程度占30.6%。二是技术水平低。据对23个省市的1,645万名工人的调查，技术等级为一至三级的占71%。三是管理水平低。在县、团级以上的企业领导干部中，熟悉业务、懂管理的只占三分之一。为了很好地解决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在结构上的结合问题，我们必须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加强对职工的培训。

第二组结合关系，是劳动者人数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因素的结合。生产的发展，主要不能靠增加劳动者人数，而应当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是因为，如果生产的发展主要靠增加劳动者人数，归根到底，会受到人口自然增长的限制，使速度很慢，经济效益很差。而劳动生产率则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劳动力质量的提高而不断提高的。因此，主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生产，不仅可以实现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而且可以降低产品成本、增加盈利，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

第三组结合关系，是生产资料的数量和生产资料利用效率这两个因素之间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货币表现就是生产基金，而生产资料利用效率则可以表现为生产基金产值率。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了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经济效益的提高，我们既要努力增加生产基金的数量，更要努力提高基金产值率。

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速度是上述各种因素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社会主义制度能够使各种因素得到较好的结合，因而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显著地快于资本主义经济。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以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来说，在1951年到1980年的三十年中，我国为12.5%，美国为4%，英国为2.3%，法国为5%，联邦德国为5.8%，日本为11.5%。<sup>③</sup>1984年比1980年，我国工业生产增长了41%，美国增长了11%，英国增长了3%，法国为零增长，联邦德国下降1%，日本增长了17%。<sup>④</sup>

根据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就可以设计出确定经济发展速度的各种公式。这些公式，主要有：

(1) 按照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者人数和劳动生产率来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其计算公式如下：

$$t_y = \frac{N_1}{N_0} \cdot \frac{L_1}{L_0} \times 100\% \dots\dots\dots (1)$$

式中， $t$ 代表速度， $y$ 代表国民收入生产额， $t_y$ 代表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发展速度， $N$ 代表劳动者人数， $L$ 代表劳动生产率， $1$ 代表计划期， $0$ 代表基期。

(2) 按照物质生产领域的生产基金数量和基金产值率来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t_y = \frac{C_1}{C_0} \cdot \frac{E_1}{E_0} \times 100\% \dots\dots\dots (2)$$

式中， $C$ 代表生产基金总量， $E$ 代表基金产值率 ( $E = \frac{y}{C}$ )

(3) 按照生产基金、平均每一劳动者的基金装备率和劳动生产率来确定经济发展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t_y = \left( \frac{C_1}{F_1} / \frac{C_0}{F_0} \right) \times \frac{L_1}{L_0} \times 100\% \dots\dots\dots (3)$$

式中， $F$ 代表平均每一劳动者的基金装备率 ( $F = \frac{C}{N}$ )。

(4) 按照积累率和积累效益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Delta t_y = \frac{H_1}{Y_1} \cdot \frac{\Delta Y_1}{H_1} \times 100\% \dots\dots\dots (4)$$

式中， $\Delta t_y$ 代表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 $H_1$ 代表计划期积累额， $Y_1$ 代表计划期国民收入， $\Delta Y_1$ 代表计划期由于积累而增加的国民收入。

假定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积累率为30%，积累效益为23%，则经济增长率为6.9% (30% × 23%)。由此可见，按公式(4)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是符合我国实际的。

但是，公式(4)只是反映了积累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未反映现行生产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讨论如何按照现行生产和积累这两个因素来确定经济增

长速度的问题。

(5) 按照现行生产和积累这两个因素来确定经济增长速度。其计算公式为:

$$\Delta t_y = \left[ \left( \frac{H_1}{Y_1} \cdot \frac{\Delta Y_{a1}}{H_1} \right) + \left( \frac{C_1}{Y_1} \cdot \frac{\Delta Y_{b1}}{C_1} \right) \right] \times 100\% \dots\dots\dots (5)$$

式中,  $\Delta Y_{a1}$ 代表计划期靠积累因素而增加的国民收入,  $\Delta Y_{b1}$ 代表计划期靠现有生产基金的使用而增加的国民收入。

公式(5)的推导如下:

如果用 $\Delta Y_1$ 代表计划期新增国民收入。则可得:

$$\Delta Y_1 = \Delta Y_{a1} + \Delta Y_{b1} \dots\dots\dots (a)$$

按国民收入计算的经济增长速度公式为:

$$\Delta t_y = \frac{\Delta Y_1}{Y_1} = \frac{\Delta Y_{a1} + \Delta Y_{b1}}{Y_1} = \frac{\Delta Y_{a1}}{Y_1} + \frac{\Delta Y_{b1}}{Y_1} \dots\dots\dots (b)$$

国民收入增长中积累因素所起的作用:

$$\frac{\Delta Y_{a1}}{Y_1} = \left( \frac{H_1}{Y_1} \cdot \frac{\Delta Y_{a1}}{H_1} \right) \times 100\% \dots\dots\dots (c)$$

国民收入增长中现有生产基金所起的作用:

$$\frac{\Delta Y_{b1}}{Y_1} = \left( \frac{C_1}{Y_1} \cdot \frac{\Delta Y_{b1}}{C_1} \right) \times 100\% \dots\dots\dots (d)$$

(D) 式中,  $C_1/Y_1$ 的经济内容为计划期单位国民收入基金占用量,  $\Delta Y_{b1}/C_1$ 的经济内容为计划期单位生产基金的产值率。

将(C)和(D)式代入(b)式, 则得公式(5)。

根据公式(5), 全社会的经济增长速度往往由于积累率过高而可能出现如下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当  $\left| \frac{\Delta Y_{a1}}{Y_1} \right| > \left| -\frac{\Delta Y_{b1}}{Y_1} \right|$  时, 虽然整个经济会有所增长, 但增长速度并不高。这种情况的出现, 主要是由于积累率过高, 挤掉了现行生产所需要的财力、物力和人力, 从而引起基金产值率和积累效益的降低。这就是为什么过高的积累率不能带来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

第二种情况: 当  $\left| \frac{\Delta Y_{a1}}{Y_1} \right| = \left| -\frac{\Delta Y_{b1}}{Y_1} \right|$  时, 整个经济出现零增长, 即国民经济停滞不前。

第三种情况: 当  $\left| \frac{\Delta Y_{a1}}{Y_1} \right| < \left| -\frac{\Delta Y_{b1}}{Y_1} \right|$  时, 整个经济出现负增长, 即国民经济是倒退的。

上述三种情况说明,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持、稳定、协调地发展, 必须正确处理积累与消费、生产与建设之间的比例关系, 必须坚持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 从提高经济效益中求速度。

### 三、速度与基数的关系

速度与基数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这是经济增长理论必须加以回答的一个基本问题。有

的同志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规模和基数越大，经济发展速度就会越慢。我们认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

第一，人类生产发展的历史证明，速度并不随着基数的增大而递减。根据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特鲁米林院士的统计分析，在整整一百万年的石器时代，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为每万年1%至2%；在五千年的铁器时代，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为每百年4%弱一点<sup>⑤</sup>；在资本主义社会，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法，“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sup>⑥</sup>

第二，不可否认，生产基数对发展速度有一定的制约作用。基数大了，每增长1%的绝对量也随之增大，从这个意义上说，基数增大后对发展速度是有一定的制约作用的。例如，当原有生产基数为1,000个单位时，如果增加100个单位，增长速度为10%；当生产基数扩大到10,000个单位时，增加500个单位，增长速度只有5%。但是，基数增大对速度的制约仅仅是基数对速度影响作用的一个方面，并且不是主要的方面。我们更应当看到，基数增大，意味着每年创造的国民收入多，在积累率不变的情况下，积累额也随之增大，从而就会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基数增大意味着物质技术基础更加雄厚，征服自然的能力和克服不利因素的能力也越来越大，从而就会促进经济更快地增长。可见，基数增大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远远超过基数增大对经济发展的制约作用，所以，速度不会因基数增大而递减。

第三，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指出：自从进入大机器工业以来，“整个生产过程不是屈从于劳动者底直接技巧，而是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sup>⑦</sup>，“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sup>⑧</sup>。据统计，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中依靠科学技术取得的已占到50—70%。<sup>⑨</sup>我国大庆油田在二十多年的开发建设中，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占到57%以上。科学技术总是在一日千里地向前发展，这就决定了速度不会因基数的增大而递减。换句话说，只有在科学技术停滞的情况下，才会出现基数增大后速度下降的现象。社会主义制度为科学技术的进步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把这种优越性充分地发挥出来。所以，速度随着基数的增大而递减，这并不是社会主义经济运动所固有的规律性。

#### 四、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

#### 盈利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学界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力争“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品、工农业总产值同步增长”，还有的同志提出，应当“力争税利和工农业产值同步增长”。在这些同志看来，实现了这种同步增长，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意见的科学性究竟如何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国民收入、盈利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及其与宏观经济效益的关系。

社会总产值是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 $c$ 、 $v$ 、 $m$ 之和，国民收入是上述五个物质生产部门的 $v$ 与 $m$ 之和。因此，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之间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实际上就是社会总产品中 $(c+v+m)$ 与 $(v+m)$ 之间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

考察这一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只能采用不变价格。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二者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反映的是二者实物量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

列宁在《论所谓市场问题》一文中，把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因素纳入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公式，探讨了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的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得出了如下的结论：“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生产，最慢的是消费资料生产。”<sup>⑩</sup>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就是  $I(c + \Delta c)$ ，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 $IIc$ ）就是  $I(v + m) - I\Delta c$ ，消费资料就是  $II(c + c + m)$ 。换句话说， $Ic$  快于  $I(v + m)$ ， $IIc$  快于  $II(c + v + m)$ ，从而社会总产品中的  $c$ （即  $Ic + IIc$ ）快于社会总产品中的  $(v + m)$  即  $I(v + m) + II(v + m)$ 。因此，按照列宁的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这是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阶段上扩大再生产的规律），一般说来，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具体地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之所以会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第一，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资金有机构成会逐步提高。科学技术进步能够节约生产单位产品的劳动消耗，但是由于活劳动消耗的节约大于物化劳动消耗的节约，因此，总的说来，资金有机构成是提高的。例如，美国制造业的资本有机构成，1963年为3.18，1972年为3.28，1976年为4.19。<sup>⑪</sup>又如，苏联的生产技术构成，1959年为1.73，1966年为2.86，1970年为3.87，1975年为5.2。<sup>⑫</sup>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产品价值构成中  $c$  的比重提高， $(v + m)$  的比重下降。因此，就资金有机构成的提高这个因素的影响作用来说，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会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第二，生产专业化协作的发展。

列宁说：专业化“按其实质来说，正象技术的发展一样没有止境。”<sup>⑬</sup>随着专业化分工的发展，加工工业产值中  $c$  的重复计算也越多，从而就会使  $c$  的增长快于  $(v + m)$ ，使社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第三，固定资产无形损耗的加剧，设备更新速度的加快。

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情况下，机器设备的无形损耗比之以前大大地加剧了。由于效率更高、质量更好的机器设备不断地出现，使原有机器设备的继续使用成为不经济的事，从而缩短了固定资产的服役期限。据美国机床合理化联合会的资料，机床无形损耗的平均周期，四十年代为十年，五十年代为八年，六十年代为五年，七十年代更短。<sup>⑭</sup>机器设备无形损耗的加剧，使产品价值构成中  $c$  的增长快于  $(v + m)$  的增长，从而也会使社会总产值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第四，生产结构的变化。

一般说来，工业品净产值  $(v + m)$  在其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小，农产品净产值在其总产值中所占比重较大。就我国建国三十年来的资料看，工业品的净产值比重为32.9—37.1%，农产品的净产值比重为69.5—79.1%。但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提高的，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是下降的。因此，就生产结构变化这个因素来看，也会使社会总产值的增长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上面我们考察了社会总产值与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那么，工农业总产

值与国民收入之间是否具有同步增长的规律性呢？回答是否定的。这首先是因为工农业总产值是工业和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 $c$ 、 $v$ 、 $m$ 之和，它的增长速度显然快于工业和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 $v+m$ ）的增长速度。其次，工农业总产值是工农业两大物质生产部门 $c$ 、 $v$ 、 $m$ 之和，而全社会的国民收入则是工业、农业、建筑业、运输业和商业五大物质生产部门 $v$ 与 $m$ 之和，二者的范围不同，严格说来，是缺乏可比性的。但是，目前，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占有很大的比重，1984年为83%，同年，工业和农业所创造的国民收入占全社会国民收入总额的84.8%。因此，总的来看，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同样会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上述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同国民收入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已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1953年至1984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2%，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8.4%，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4%。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情况看，同样如此。1979年至1984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1%，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9.1%，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3%。我国各个时期三者增长速度的对比关系，可见下表：

	社会总产值 年平均增长 速度%	工农业总产 值平均增长 速度%	国民收入 年平均增 长速度%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社 会总产值增长率之比 (以后者为1)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 工农业增长率之比 (以后者为1)
“一五”期间	11.3	10.9	8.9	0.79	0.82
“二五”期间	-0.4	0.6	-3.1	—	—
1963—1965年	15.5	15.7	14.7	0.95	0.94
“三五”期间	9.3	9.6	8.3	0.89	0.86
“四五”期间	7.3	7.8	5.5	0.75	0.71
“五五”期间	8.3	8.1	6.0	0.72	0.74
1953—1984年	8.2	8.4	6.4	0.77	0.76
1979—1984年	9.1	9.1	8.3	0.91	0.91
1981—1984年	9.5	9.6	9.2	0.97	0.96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21、28、34页

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是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只要这个过程没有完结，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率都会分别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必然会发生作用。具体地说，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第一，国民经济各生产部门的资金有机构成将会逐步提高；第二，生产结构的变化将会使物质消耗多的工业和建筑业部门的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逐步提高；第三，专业化协作将会更加广泛地发展，加工深度将会进一步提高。由此可见，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这是机器劳动代替手工劳动的技术进步阶段上的一种长期的合乎规律的现象。当然，就个别年份、个别时期来说，也有可能出现三者的“同步增长”，甚至可能出现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快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例如，苏联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6.5%，国民收入也是平均每年增长6.5%。又如，1963年比1962年，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了10.7%，而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只分别增

长了10.2%和9.5%。<sup>⑥</sup>但是，如果把个别时期的情况当作规律性的现象来看待，那就欠妥了。

最后，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税利即盈利和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之间是否具有同步增长的规律性呢？回答是否定的。

盈利是社会总产品价值构成中的 $m$ 部分， $m$ 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知道，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都分别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也快于盈利的增长速度。因此，这里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是：盈利和国民收入之间何者增长更快？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对于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分配比例的安排，应当遵循“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并使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慢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按照这一原则，国民收入中 $v$ 的增长速度就会慢于 $m$ 的增长速度，因此，盈利 $m$ 的增长速度就会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盈利的增长速度虽然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但却慢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因为盈利 $m$ 是国民收入的一部分，而整个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是慢于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的。总起来看，增长最快的是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其次是盈利，再次是国民收入。这就是它们之间增长速度对比关系的规律性。

有的同志认为，实现了国民收入（或盈利）同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就意味着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看法，值得商榷。这里，我们着重指出如下三点：

第一，在一般情况下，国民收入或盈利的增长速度慢于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只有在个别时期才有可能出现同步增长的现象。因此，把实现上述同步增长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般要求来提出，显然是不恰当的。

第二，把实现上述同步增长看作是宏观经济效益提高的标志，这在理论上也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影响宏观经济效益的一些重要因素，恰恰是使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是促进宏观经济效益提高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一因素有助于提高劳动者的技术装备程度和提高资金有机构成，从而就会使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又如，生产结构的合理化，专业化协作的广泛发展，都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重要因素，但是，如前所说，这些因素同样会使社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快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第三，退一步说，即使实现了国民收入与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也并不意味着宏观经济就好。例如，我国“一五”时期，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与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率之比为1：0.79，而“三五”时期为1：0.89。应当说，“三五”时期要比“一五”时期更接近于同步增长。但是，“三五”时期的宏观经济效益是显著下降的。其中，“一五”时期社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增长6.5%， “三五”时期为4.3%；“一五”时期的积累效益为35%， “三五”时期下降为26%；“一五”时期国营工业企业的资金盈利率为29.4%， “三五”时期下降为18.9%。<sup>⑦</sup>又如，苏联在1976年至1980年期间，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均为4.2%，这算是实现了同步增长。但是，这一时期苏联的资金产值率平均每年下降2.3%。<sup>⑧</sup>这就说明，把实现国民收入和社会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的同步增长看作是宏观经济效益提高的标志，是缺乏事实根据的。

## 五、经济增长速度的质量问题

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应当是多、快、好、省的统一。如果说“多和快”是反映经济增长的数量方面，那么“好和省”则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方面。经济增长中的“好和省”的问题，实质上就是提高经济效益的问题。因为经济效益是投入与产出的比较。取得同样多的符合社会和人民需要的成果，劳动消耗或劳动占用越少，经济效益就越大。因此，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可以用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

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程度综合反映了社会主义经济效益。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在社会总劳动时间是既定的情况下，为了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就必须节约劳动消耗，以最少的劳动消耗生产出人民所需要的各种产品。因此，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可以用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来反映。这就是说，经济每增长1%，能够使人均实际消费水平提高多少。经济的增长能够使人民得到的实惠越多，经济增长的质量就越高。衡量人民消费水平合理增长的标志是：第一，国民收入在积累与消费之间的分配必须保持恰当的比例；第二，全社会消费基金的增长速度应当慢于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第三，人均实际消费水平的提高速度应当慢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第四，社会消费品购买力应当与市场消费品可供量相适应。总之，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应当是速度恰当，经济效益较好，使人民能够得到更多的实惠。这样的增长速度，才是质量好的速度。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就必须使初级产品、中间产品、最终产品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使生产资料生产与消费资料生产保持恰当的比例，使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之间保持恰当的比例，使产业结构合理化。也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宏观经济效益，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更好地满足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要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还必须十分注意增加花色品种，提高产品质量，使产品的品种和质量都能适合人民的需要。

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质量较差，这主要表现在：第一，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不合理，难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迅速增长；第二，产品品种少、质量差，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的需要；第三，宏观经济效益低，在同样多的劳动消耗与劳动占用下所生产的有用成果和盈利少。所有这些都说明，在目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问题上，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于质量。因此，我们不仅应重视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更要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问题。我国各个时期经济增长的质量状况，可见下表：

从我国目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来看，上述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以55%为宜。这就是说，只要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7%左右，就可以使居民实际消费水平平均每年增长4%左右。这样，既可以保证社会主义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又可以保证人民生活的改善。

	经济增长率 <sup>⑧</sup> (按国民收入计算)	居民实际消费 水平增长率 <sup>⑨</sup>	经济增长 的质量指标 %
	(1)	(2)	(3) = (2) + (1)
“一五”时期平均	8.9	3.2	36
“二五”时期平均	-3.1	—	—
1963—1965年平均	14.7	6.0	41
“三五”时期平均	8.3	2.2	27
“四五”时期平均	5.5	2.1	38
“五五”时期平均	6.0	4.8	80
1953—1984年平均	6.4	3.3	52
1979—1984年平均	8.3	7.9	95
1981—1984年平均	9.2	9.6	104

## 六、社会主义经济增长的基本原则

根据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和马克思主义社会再生产基本原理，根据我国三十多年来在经济增长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必须遵循以下的基本原则：

第一，只有按比例，才能有高速度。

国民经济各部门和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只有自觉地遵循国民经济协调发展所需要的客观比例，社会主义经济才能持续地增长。在“一五”时期，由于我们在计划安排上注意了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结果取得了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3%、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9%的高速度发展。相反，在“二五”时期，由于忽视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用削弱农业和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结果导致重大比例失调，使社会总产值不但没有增长，反而下降了0.4%，国民收入下降3.1%。在1963—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由于我们重视了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把失调的比例调整了过来，结果使我们又取得了社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5%、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5.7%、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14.7%的高速度发展。因此，陈云同志说：只有按比例，才能有高速度。这是我们处理速度与比例关系的一条基本经验。

第二，速度的快慢，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而取决于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可能。

从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说，当然是速度快一点好。但是，在一定的生产技术和财力物力人力的条件下，速度具有客观性，不是想要多快就能有多快。只有把需要和可能、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正确地结合起来，才能把良好的愿望变成现实。

从客观条件来看，速度的快慢，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另一个是物的因素。就人的因素来说，速度的快慢，取决于投入生产的活劳动量的增加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就物的因素来说，速度的快慢，取决于生产基金总量的增加和基金产值率的提高。在一

定时期内，特别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无论是活劳动和生产基金总量的增加，还是劳动生产率和基金产值率的提高，都是有一定限度的，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也是有一定客观界限的。我们只能在这四个因素的正确结合下，在充分发挥这四个因素的作用下，力争较快的速度。

第三，速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经济发展速度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这是因为，影响速度的各种因素在短期内都不会有显著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企图在一、两年之内就实现全社会生产的“翻番”和“跃进”。还应当看到，社会再生产速度，是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再生产各方面按比例协调发展下的速度。部门之间的这种联系和制约作用，不仅使社会再生产速度，而且使每个部门的发展速度，都呈现出相对的稳定性。

第四，我们所要的速度，不是一时的较快增长，而是持续、稳定地较快增长。

国民经济的按比例发展，要求我们在安排速度时认真搞好财力、物力和人力的各自平衡和综合平衡。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稳定的增长。贪图一时的高速度，拼人力、拼设备，必然使后续时期的发展速度放慢，形成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十几年之后算总帐，要比以扎扎实实的速度稳步地向前发展，慢得多。陈云同志指出：“脚踏实地按部就班地干，经济发展就快；急于求成，经济发展就慢。”<sup>①</sup>邓小平同志也指出：如果过去“老老实实按部就班地干，我们的工农业生产和科学、教育一定有了很大发展，人民的生活一定有了较大的改善。拿钢来说，平平稳稳地发展，起码也可以生产五千万吨到六千万吨，而且合用。”<sup>②</sup>

第五，我们所要的速度，是经济效益好的速度。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发展速度是一定的比例关系和经济效益的综合反映。离开了按比例和经济效益，片面追求速度，投入多、产出少，产品不为社会所需要，则速度越高，浪费越大。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要受经济效益的制约，我们应当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较快的速度。要做到速度和效益的统一，应当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速度指标要切合实际，量力而行。为此，就要在搞综合平衡的基础上确定速度指标。

第二，生产的总量和结构要符合社会的需要。在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需要具体表现为市场的需要，因此，必须搞好市场的长期预测。

第三，坚持质量第一，努力开发新产品，提高产品质量。

总起来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增长，必须符合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符合按比例发展的要求，符合经济效益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高效益地增长。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58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62页。

③ 《中国统计年鉴》（1981年），第485页。

④ 《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637页。

⑤ 参阅《苏联经济学界关于速度与比例讨论文集》第2页。

⑥ 《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8页。

⑦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8分册，第349页。

## 袁宝华校长回访卡尔·马克思大学 双方共同签署两校科学合作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一九八七年至一九九〇年将在八个领域同民主德国卡尔·马克思大学进行科学合作。

这项科学合作计划是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三日由袁宝华校长和卡尔马克思大学校长拉特曼根据一九八六年一月十一日签订的两校校际科学合作协定精神，在莱比锡签署的。这八个领域有：汉学，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史、中国隋至明哲学史（包括中国佛教）、中国法家和法律史问题、中国通史；哲学，包括唯物辩证法的诸范围、马列主义认识论的有关问题、马列主义理论在科技革命条件下的发展问题、古代哲学史、文化史问题、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史研究、西欧资产阶级当代哲学的分析研究、“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批判、伦理学和美学研究；政治经济学，包括社会主义经济机制中对商品生产诸范畴的有计划的利用、社会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科学社会主义，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制度、马列主义政治理论的基础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意义、工人阶级和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层联盟的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现、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治组织（多党制）、资产阶级政治学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民族解放运动在世界革命过程中的地位、帝国主义的新的殖民主义政策、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危机及其解决的可能性、新的国际经济关系及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非殖民主义化；历史学，包括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史、马列主义史、德国共产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工人运动史，尤其是梅林和拉萨尔的活动、近代革命史的比较研究（1492—1917）、对阶级社会最初形态的产生与形成的比较研究；部门经济，包括工业经济；工业联合企业和工业企业中的自动化、贸易经济；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经济信息处理；工业联合企业和工业企业中的电子化数据处理、社会主义工业联合企业的领导、计划和经济核算管理；法学，包括国际公法问题、社会主义经济法研究；德国语言和文学研究。在上述各领域，双方将互相交流教育、教学和科研经验，互相探讨编写教学大纲问题，免费交换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互相派人讲学；共同进行科学研究，互相支持对方完成科研项目；互相免费交换教科书、教学资料和视听材料；互赠专著和专业刊物以及有关本国概况的资料；每年双方分别接受一至二人参加假期德语培训和汉语培训；相互接受进修生；双方各派出一名德语教师和汉语教师到对方讲学。

（周建明）

- 
-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4页。
  - ⑨ 参阅《红旗》杂志1981年第7期，第38页。
  - ⑩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71页。
  - ⑪ 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第194页。
  - ⑫ 林振淦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生活状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5页。
  - ⑬ 《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84页。
  - ⑭ 转引自王梦奎著《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第198页。
  - ⑮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21、28、34页。
  - ⑯⑰ 《计划经济研究》1984年第4期，第22页。
  - ⑱ 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34、552页。
  - ⑲ 根据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1985年）第552页计算的。
  - ⑳ 《人民日报》1982年1月26日第1版。
  - ㉑ 《邓小平文选》第213页。

（本文责任编辑 兴华）